

张 谦 著

《资 治 通 鉴》

与中国政治文化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资治通鉴》与中国政治文化

张 谦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京)新登字 097 号

《资治通鉴》与中国政治文化

张谦 著

*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外广播电影电视部灰楼 邮政编码 100866)

朝阳第一教师进修学校胶印厂印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 10.5 印张 232 (千) 字

1993 年 2 月第 1 版 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5.10 元

ISBN 7-5043-2005-6/G·746

序

读死书会变成书呆子，甚至于成为书橱。这是鲁迅先生1934年在一篇题为《读几本书》的文章中说的一句话。今年暑期，张谦同志给我谈了他最近读完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并联系中国的政治发展，完成了一部书稿——《〈资治通鉴〉与中国政治文化》。这又使我想起了鲁迅先生五十六年前说的这句话的意义。

读书当联系实际，并有所收获，这样才能生动活泼，富于实际价值。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便会害人。特别是读古书，不联系实际，古为今用，就无异于“发思古之幽情”，枯燥乏味。对长达300多万字的《资治通鉴》，读死了，费时费力，收获不大，只有与我国的国情、政情、社情、民情联系起来研读，才能读活了。记得，60年代初，中央党校曾给一些中高级干部开设过《资治通鉴》选读课，当时就强调要联系实际，立足于了解我国的历史传统和基本国情，从历史传统中寻找建设新社会的政治智慧。

作者把这部书稿送我审阅，并请我作序。本来，我没有这么多空闲时间去看这二十多万字书稿，而且还有“王婆子卖瓜，自卖自夸”之嫌，但最终在作者的恳求下，还是认真地接受了。一来，觉得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很有价值，研究得

好，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优良传统，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也不无裨益。二来，我也有责任从书稿中了解一下作者目前在研究什么，思考什么，并尽可能地给以必要的帮助和指导。

在本书中，最使我感兴趣的，就是作者将“批判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统一起来的建设性研究态度。作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试图从大量生动的历史素材中，实事求是地分析论证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需要加以改造和剔除的“封建性糟粕”，以及有待进一步批判地继承和发扬光大的“民主性精华”。这样的工作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近年来，在我国学术界，一度兴起“文化热”，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探讨和著述，颇有“天下墨争磨”的景象。但总的说来，无外乎从思想史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即从历史上每一时代的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出发，来反思和概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这方面的研究，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光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还远不能概括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全部内容。正如作者在“引言”中所讲的，“只有那些与社会政治发展和人们日常政治行为密切相关的政治价值、政治态度、政治情感以及行为模式，才是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这部分内容都是在以往和现实人们的政治活动关系中体现着。它是历史上和当代政治人所‘习闻明知，身体力行’的”。这就要求，既要研究传统政治人的价值系统，又要研究其行为模式，也就是说，要从其“言”和“行”两个方面来进行全面的分析和研究，进而比较系统地从中总结出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以便我们今天借鉴和参考。我认为，这

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研究需要解决的主要课题。

所以，作者从政治学，特别是政治史的角度实证地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就显得更具体、更实在、更全面，也更有必要。这种研究，不是简单地按历史顺序罗列事实，而是对传统政治文化所涵盖的主要内容，就治国之道、官场文化、政治价值、政治权力、政治原则、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以及政治理想模式等方面，进行详实的论证、深入的剖析和系统的研究，从大量的活生生的政治活动关系中寻找其历史的统一性，从而全面地揭示传统政治文化的“深层结构”，准确地把握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实际价值和核心精神。这可以说是传统政治文化研究的一个方向，也是一种新的探索。

当然，这种研究还是初步的，作者尽管下了很大的功夫，但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还是需要进一步完善的。我相信作者将会在这一研究领域取得更好的成绩！

赵从德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中旬记于古城西安北院门

自序

在本书中,我试图从政治史的角度,阐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涵盖的需要加以改造和剔除的封建专制主义糟粕,以及有待进一步发扬光大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主性精华。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确有它自己的特色。早在17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奠基人魁奈就曾一度醉心于研究中国的政治传统和专制制度。他由于写了一篇《中国的君主专制主义》论文,而在当时获得了“法兰西孔子”的雅号。当代政治人类学家卡尔·威特福格尔(Karl Wittfogel)1965年写了一部名为《东方专制政制》的学术专著。其中,大部分内容也都是在论述中国的政治传统和专制主义的起源。此后,西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层出不穷,在这方面的著述有增无减。

然而,尽管他们在学术上主张“价值祛除”,但由于长期生活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下,他们对中国政治的研究,往往不能摆脱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理应把重点放在本国问题上。过去我一直学习西方政治学,但后来发现,光研究“参照系”,而不研究本国的政治传统和政治现实,并无多大实际价值。

基于这一思考,从1985年考上北京大学研究生攻读政治学专业起,我就逐渐转向了本土政治的研究。首先我从《资治通鉴》读起,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进行了初步的实证研究。在

读书中发现,《资治通鉴》是一部经史合流的古代政治史巨著,不研究它,就难以全面地了解中国的政治传统。柏杨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还是很有道理的。他说:“《资治通鉴》上各式各样的行为模子,迄今仍然不断浇出同类的产品。不细读《资治通鉴》,要想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政治,以及展望中国前途,根本不可能。”

怎样看待《资治通鉴》?我想,毛泽东同志说的最为明确了。1954年冬,他在与吴晗谈起整理、标点《资治通鉴》时指出:“《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在50年代,我们把《资治通鉴》的线装本加以整理、标点,近几年又把它翻译成现代语文版本,让更多的人能读懂。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研究其历史价值,从中找出要批判的内容和可资借鉴的东西。

这本小册子,就是我从政治史角度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次尝试。但由于水平有限,欠妥之处在所难免。因此,恳切希望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张 谦

1989年4月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专业基础理论部政治学室

1990年8月修改于古城西安和平门“人境庐”书屋

目 录

1. 引言：帝王之学

- 君主专制的副产品：“帝王学”……………（ 1 ）
- 《资治通鉴》：帝王的镜子……………（ 6 ）
- 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不可忽视的一面 ……（ 9 ）

2. 政治价值

- 政治的含义：权力的夺取和运用……………（ 20 ）
- “仁”与性善说 ……（ 28 ）
- 尚“公”与国家本位 ……（ 35 ）
- 隆君与官本位 ……（ 42 ）
- 贵秩序与“大一统” ……（ 48 ）

3. 政治原则

- 纪纲：专制帝王的符号操纵……………（ 54 ）
- 重礼教与正名分 ……（ 57 ）
- “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 ……（ 62 ）
- 皇位终身和世袭制 ……（ 67 ）
- 禁绝百家，独尊于一……………（ 70 ）
- 军国政刑一体 ……（ 74 ）

4. 政治思想

- 道统与政统 ……（ 77 ）
- 王权主义 ……（ 83 ）
- 权术理论 ……（ 88 ）
- 民本思想：专制下的民主观……………（ 94 ）
- 吏治思想：一个重要的补充……………（ 99 ）

5. 治国之道

- 治家与治国 (103)
- “外儒内法”模式 (106)
- 推行教化 (110)
- 用人重德 (115)
- “治权”与“事权” (119)
- 进谏与纳谏 (123)
- 重本抑末 (126)

6. 官场文化

- 一种奇特的亚政治文化 (129)
- 官场中的“游戏规则” (133)
- 官场哲学(1):“和合”人际关系的法则 (136)
- 官场哲学(2):妒贤嫉能、排斥异己 (141)
- 官场哲学(3):明哲保身、但求无过 (146)
- 上则荣、下则辱:浓重的权力意志 (148)

7. 政治心理

- 帝王的个性特征 (151)
- 畏惧王权、崇拜王权 (157)
- “天高皇帝远”与庶民意识 (164)
- “清官”与清官意识 (167)
- “士”与忧国忧民 (170)
- 牢固的守成心理 (173)
-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排他性的防范心理 (176)

8. 政治理想

- 开明专制:中国人的“理想国” (179)
- 和谐、稳定与“天下太平” (187)
- “贤者在位,能者在职” (192)

“大同”、“小康”:均平的社会模式	(195)
-------------------------	-------

9. 历史的启示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要走向腐化	(199)
权力价值、权力文化与一元化	(205)
官场文化:扼杀民主与效率的内在因素	(210)
公民文化匮乏与民主政治发展	(214)
制度比人更重要	(221)

附录 I :《资治通鉴》嘉言选摘

一、立国篇	(226)
二、为政篇	(231)
三、法律篇	(240)
四、政治伦理篇	(242)
五、人际关系篇	(244)
六、修身养性篇	(246)
七、居安思危篇	(249)

附录 II :《资治通鉴》名谏选译

一、荀子论政	(251)
二、范雎反对太后干政	(255)
三、贾谊的《治安策》	(258)
四、董仲舒的《举贤良对策》	(272)
五、荀悦的“四患”、“五政”	(286)
六、仲长统的《昌言》	(288)
七、韩显宗论治道	(291)
八、陆贽论广开言路	(297)
九、司马光论宦官	(313)

后 记	(322)
-----------	-------

1. 引言：帝王之学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

——恩格斯

历史学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人已经做过什么，因此就告诉我们人是什么。

——柯林武德

君主专制的副产品：“帝王学”

在中国古代，君主称作“皇帝”，历来是封建专制政体的唯一主宰，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来自皇帝个人，“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①。二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仿佛“没有时间”，“没有历史”，王朝的不断“再生产”，官僚制度的不断强化，使得中国封建专制政治形态周而复始，成为世界上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2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展最完备、生命力最强的一种专制政治形态。

历史上，对这样一种颇具“审美色彩”的专制政治形态，西方一些致力于研究人类发展基本规律的学人曾大费笔墨，试图从中获得某种启示。由于中国封建专制形态的特殊性，不论是法国的孟德斯鸠，还是德国的黑格尔、美国的弗雷泽尔，都一致将其概括为“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以别于西方专制制度。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没有忽视对中国专制制度的探讨。早在1853年，马克思就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分析过中国专制主义的政治结构及其特色。在他看来，“中国皇帝的威权”是至高无上的，“家长制的权力”支配一切。“就象皇帝通常被尊为全国的君父一样，皇帝的每一个官吏也都在他所管辖的地区内被看做是这种父权的代表。”直到鸦片战争，中国专制政治那种“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①才被打破。后来，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等著作中，也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这一问题。不仅如此，为了阐明东方专制主义产生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并指出那种以农村公社为单位、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或亚细亚形态，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①

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为了恢复“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儒家多从诗、书、礼、乐等方面，倡导君主的教育。在儒家看来，君主的道德完善，是整个社会政治完善的基础。如果人君能通过礼乐的学习，不断完善自己的德性，修身齐家，正心诚意，格物致知，那么就会出现“德成而教尊，教尊而官正，官正而国治”的政治局面，而不必在诈术上下功夫。譬如，荀子说：“用国者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②这里是讲，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者，能够树立礼义，就可以当圣王，能够树立信誉，就可以当霸主，如果只靠权术，那就必然灭亡。然而，这实际上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帝王的精神。

汉初，新一代帝王，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简约律法，予民休息。文帝崇尚黄老无为而治；景帝崇尚申韩刑名之法，都致力于通过“迂回”的办法，达其“国治”，仅用了五、六十年的时间，经济发展，社会风俗焕然一新，民心趋于稳定。此时，帝王学的内容大都离不开黄老无为思想和申韩刑名之术。儒家的仁义学说实际上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晁错在给景帝的奏章中说：作为皇帝，应“知所以临制下而治其众，则群臣畏服矣；知所以折言受事，则不欺蔽矣；知所以安利万民，则海内从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则臣子之行备矣。”^③这是地地道道的君王“南面之术”，与儒家学派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资治通鉴》卷四。

③ 《汉书·晁错传》卷四十九。

倡导背道而驰。但是，形势的变化，这种专治黄老之学，日趋不适应封建大一统的需要。“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以奢侈，室庐、舆服僭于上，无限度。”^①

特别是，从汉高祖到汉景帝七十年间，功臣、外戚和宗室叛乱事件此起彼伏，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帝王之学。而原来诸子百家中，以儒、道、墨为最显，老子主张无为而治，墨家主张兼爱、平等、尚贤、使能，都不利于专制统治，唯独儒家学说，严等级、贵秩序，与人民言服从，与君主言“仁政”，合乎现实需要。所以，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帝王学，亦由黄老申韩之学转为儒家经术文学。此后，经权互用，明习经典，通晓治术，就成为帝王们的共同特征。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战乱、灾祸不断发生，人们更多关心的是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等问题，而儒家学说又不能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所以，道佛兴起，在文化上我国进入了儒佛道合流时期。受这种文化背景的影响，帝王学也渗透了诸如“因果报应”、“三世轮回”、“精神不灭”等佛家说教。据史书记载，梁武帝萧衍曾四度舍身入佛，并下诏宣布佛教为九十六种道教中的唯一“正道”。^②后来被司马光称之为“不爱其身而爱民，不以无益废有益”的“仁君”周世宗，也声称：“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③这个时期，许多君主在学术上都有高深的造诣，堪称“君师

① 《资治通鉴》卷十六。

② 韩国磐著：《魏晋南北朝史纲》第446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 《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二。

兼备”的帝王。

降至唐代，封建专制制度进入了鼎盛时期。总结统治经验，巩固君主权势，已成为帝王学的主题。帝王们开始强调以古为鉴，从历史中明习为君和治国之道。唐太宗在魏征去世之后，对左右大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①“帝王欲自观国史，知前日之恶，为后来之戒。”^②这时，史学遂成为帝王们温习中国政治传统，用以“资治”的主要素材。一方面，帝王们根据自己的切身经历为子孙撰写训诫，比如唐太宗的《帝范》，包括“君体、建亲、求贤、审官、纳谏、去谄、诫盈、崇俭、崇罚、务实、阅武、崇文”十二篇，全然是为后来帝王所作。另一方面，帝王们又委托史官们总结和研究历代君臣的事迹，整理成册，以备帝王学习之用。比如，《贞观政要》就是唐代一本最简明扼要的“帝王学概论”。

这种帝王以史为学的倾向，到北宋发展到高峰，出现了众多的史学巨著，其中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最为著名。后来，这部长达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万字的史籍，成为历代帝王修身治国的“圣经”。

帝王学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成熟的一大标志。在客观上，它一方面多少起到了塑造封建统治者良好形象、制约其不良行为发展的积极效用；另一方面，对于形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过分强调君主个人人格对国家的价值的价值观念，也的确产生了消极影响。国家的命运全然系在君主一个人的裤腰带上，君主个人的品性、好恶、敏愚，

①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六。

② 《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七。

举手投足，都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治乱兴衰。唐代吴兢在《贞观政要》中总结说：“昔秦皇、汉武，外则穷极兵戈，内则崇侈宫室，人力既竭，祸难遂兴，……夫安人宁国，惟在于君。”司马光也说：“夫国之治乱尽在人君。”（《稽古录》卷六）“夫国治乱安危之本，皆在人君之心。”（《传家集·进修心治之要扎子状》）“天下安危治乱不在于他，在于人主方寸之地而矣。”（《传家集·上皇太后疏》）“凡君贤者，其国治；君不能者，其国乱。”（《资治通鉴》卷六）

与这种政治观念相适应，千百年来，中国人绞尽脑汁、上下求索的主要是一位“好皇帝”。

《资治通鉴》：帝王的镜子

传统中国人心目中的“好皇帝”，基本上都有善于以史为鉴的特点。他们勤于读书，从历史中寻找治国理政的素材，树立自己的帝王形象。自从《资治通鉴》问世以来，历代帝王都如获珍宝，把它作为一面镜子，以资治道。

九百多年来，《资治通鉴》以其不变的政治主题——权力斗争，在中国政治阶层中倍受推崇，并且绵绵不断地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具体来说，是因为这部史籍：

- 第一，以帝王夺取和运用政权为线索；
- 第二，记述了历代帝王的成败得失；
- 第三，蕴含着中国的政治传统和政治智慧；
- 第四，记载了中国上千年治乱兴衰的历史轨迹；
- 第五，汇总了中国古代官场社会的矛盾斗争。

所以，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说：“为人君而不知《通